

# 引 言

历史上，教育既是发展中的民族国家的本源，又是其产儿。民族性国家教育体系是一种普及的、公共的制度，它首先产生于欧洲革命后期，它是国家形成的一种工具，它提供了一种建造和统一新民族国家的强有力的手段，并成为其重要的制度支撑之一。从此以后，很少有国家在没有依赖于其意识形态的潜在力量时就开始国家独立的进程。即使在先前的发达国家，至少在战争和危机时期，教育一直被视为国家凝聚力的宝贵资源、经济发展的关键工具。然而，民族国家的作用正处在变革之中，伴随着它的教育的地位也正在发生变革。

新的全球力量正在改变着民族国家的世界体系。对于许多社会科学家而言，全球化具有革命性的后果，不仅在世界经济领域，而且在政治和文化领域也是一样的。国民经济由于资本、商品、服务和信息在世界市场上的相互依存性愈益突出而不断受到侵蚀。多国公司成为跨国实体，这些公司重新部署了他们的行动，获取高额利润，并且超越了国家控制的权力。同样，流动的金融资本无所不在，正如福柯

(Foucault) 眼中的权力 (或自然神论者眼中的上帝) 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面对无法控制的世界市场力量, 政府对货币、财政和劳动市场政策不再拥有绝对的控制力; 国民经济不再能够被管理。

信息技术和现代通讯也正在改变着文化和政治。时空被压缩, 新的全球文化开始崛起, 它代替了民族文化, 其同一性和特殊性远比民族文化更明显。民族国家的自主性被新的政治机构削弱, 从外部来讲, 是超国家、地区和世界联合性组织的增长; 从内部来讲, 是地区主义的增长。

民族国家也正在失去其军事主权; 它不再拥有合法暴力的垄断权, 这种暴力至少对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 而言是国家自我确认的条件。1989 年冷战的结束, 标志着世界被划分成超级军事集团二分时代的结束。“权力平衡”的旧体系曾经让世界保持了战争和平达到 200 年之久, 现在却结束了。我们进入到一个变动不居的国际关系时代, 在这里, 秩序和安全相对稳定的地区与混乱且不确定性的地区局促地共存着 (Cooper, 1996)。东西方的发达国家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帝国冲动和领土野心。他们不想再相互对抗了, 即使他们真要对抗, 也将受核武器和防御地区化的制约。发展中的世界仍然还有处于危险和紧张状态之下的地区, 这些地区由于富裕和贫穷国家之间的鸿沟的不断加深而变得更加恶化, 这种鸿沟每天通过全球通讯而更为醒目。但是, 正如海湾战争所表明的, 发达世界仍然保持着足以应对对其地位提出各种挑战的压倒优势的军事力量。至少在目前来说, 即使不稳定, 世界关系中仍然还有一种建立在新原则基础之上的新秩序。

这种所谓的国际关系的“降温”和维系国家地位的军事原则的削弱使发达民族国家陷入了身份认同危机当中。自从 17 世纪国家的世界体系形成以来, 军事需要为民族国家提供重要的政治理由或外交理由。事实上, 它主要是基于国防需要而存在的 (Tilly, 1990)。自宗教改革以来, 如伊丽莎白一世明确指出的, 这是一种平常的治国之

术，即民族统一只能通过面对共同外敌时才得以实现。冷战把这种原则体现到了极致（Chomsky, 1969）。但是自此以后，它就已经成为“虚拟战争”政治，这种政治因美国在越南的崩溃和在海湾的“媒介战”而推进。现在发达国家不再拥有这种“轻松的”选择。他们必须为民族认同和社会凝聚找到新的基础。

21 世纪，对民族国家的威胁将同时来自内部和外部。洛克比、哈格夫、都柏林、俄克拉荷马、东京地铁和亚瑟港发生的灾难都悲惨地表明了，暴力手段更加个人化、隐蔽化。但是社会暴力的问题远比这些极端的例子要严重得多，它与现代多元社会中社会团结的基础相关。在未来的世纪里，对民族国家的主要挑战将是找到与全球秩序中他们的新角色相一致的社会团结的新的途径。

教育在这种“后国家”时代的作用是什么？民族国家在一个全球市场和超国家政治组织的世界里如何更有效地控制他们的教育体系？面对国际聚合的压力，民族性国家教育体系如何保持其特色？通过教育，国家如何更深入地促进“民族文化”以及在多元社会里应当采取何种形式？民族性国家教育体系还会有未来吗？

后现代主义认为，它将会消亡（Usher and Edwards, 1994）。确实，后现代和全球化理论的整个逻辑在于，民族性国家教育体系自身现在已经死亡，它会很快变成无关紧要的、不合时宜的和不可能的。政府不再有权力决定他们的国民制度。他们一方面日渐放弃对地区和国际组织的控制（Sultana, 1995），另一方面放弃了对消费者的控制（Chubb and Moe, 1990）。面对全球共同的需求，受到超国家团体的影响，教育体系聚合到一种共同的工具性规范上来，不再能够保持他们的独特的国民性（Avis 等, 1996）。随着社会多元性的增长和文化的碎片化，教育体系日益私人化，且变得个人主义，其公共的和集体的联系也因而丧失。政府不再能够利用教育促进社会凝聚，不再能够利用教育传递民族文化，也不应再做这样的尝试（Donald, 1992）。随着民族国家在新的世界秩序中变为一种边缘力量，教育也成为全球

市场中交付的一种个人化的生活消费品，通过卫星和电缆可以实现全球交换。民族性国家教育消失了。

显然这些观点有其一定的基础。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毁灭性结果使发达国家在利用教育促进民族认同方面谨小慎微，正如移民人口的不断吸收，迫使它们对民族认同应当由什么构成的问题不得不再三思考。在所谓的 20 世纪 90 年代的后现代世界，国家发现决定什么是“民族性国家”教育以及如何控制的问题更加困难。社会多元主义急迫地提出民族文化和社会整合的潜在资源方面的基本问题。政府发现越来越难以管理公共教育体系的费用和控制其复杂度。新的全球趋势削弱了某些方面的国家主权和威权，战后凯恩斯主义的崩溃提出了有关政府能够管理和提供必要服务的程度问题，因为更具辨别力和更高要求的公众需要更高的服务标准。有些政府在面对所有这些问题的时候撤退到了一种无知政治，强调国家行动的有限范围，采取了费用不多、政治风险不大的分权化或私营化的教育策略。当东亚新兴的民族性国家的教育繁荣的时候，在先前的发达国家，民族性的公共教育体系的观念却日益受到质疑。

民族性国家教育体系的作用已经改变，尤其在先前发达的民族国家，政府无法以老方法来管理教育。教育体系的原初功能在于培养社会的整合力和凝聚力，铸造国家公民和民族认同的新观念。这一直是自 1917 年以来新兴国家发展和先前发达的国家民族危机和战争时期的惯例。然而，正如本书所讨论的，先前发达的民族国家内部的教育动力已经改变。随着国家的地位巩固和维护，以及战后国际经济竞争的不断加剧，教育已部分地失去这种塑造性的使命和目的。在现在的发达国家，除了日本这个特例，教育主要被看做是个体和集体经济增长的一种手段。公民塑造让位于技能的形成，国家建设让位于国民经济竞争。教育计划的公共性和集体性部分地丧失了，至少目前是由个人主义的抱负和标准所取代。这种进程的发生也并非一致，即使在先前发达的民族国家内部也一样。确实这一点在欧陆国家比在不列颠英

语世界、北美洲和澳洲要逊色一些。但无论如何这种趋势正在扩大。

然而，这里全部的争论在于反对后现代主义者和全球化理论家的极端方案。人们认为民族国家将生存下去，它是政治代表和责任的可生存基地，是国际治理的建设基础。仍然将会有国民经济，虽然日益依赖于世界市场。国家政府将继续把教育看做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工具，无论是经济的还是社会的，它努力让教育为实现这些目的而服务，虽然这点不太容易实现。事实上，他们可以更依赖于教育。资本、货物和观念日益全球化，人力和技能仍是国家固有资源的一小部分，政府可以把教育视为国家政策最有效的保留工具之一。在全球市场中它对国家经济竞争的作用日益重要。它也可以被视为社会凝聚和公民认同的重要工具。在体现了多样性文化和家庭生活模式约束力不足等特征的世俗社会，几乎很少有保留下来的制度能够发挥这种功能。

教育体系，虽然在生源和观念上日益向国际市场开放，但仍然保留着主要由国家控制的民族性国家制度。它们将继续追求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国家目标，塑造公民和使其形成技能。但是希望它们能够摒弃具有内部视角的文化民族主义意识形态陷阱，这种民族主义强调民族性和语言是民族认同的基础。

意识到国家的相互依赖性、社会的多元性以及解决世界问题所必不可少的全球性的现代公民教育，将远离民族性国家体系中曾经体现的狭隘的文化沙文主义。但是同样要认识到现代社会的凝聚力和团结的重要性，教育将努力促进新的更加包容的民族认同的形式。这就是公民民族认同，它建立在共同的政治责任、理解而非分裂的文化神话之基础上。它要指向未来而非过去。现代教育计划在于塑造新的、更民主的社会以及培养维持社会的公民，而不是传递和再生产历史文化和认同。

为了理解这一点，理解教育在全球时代发生变革的作用，很重要的一点是，看看教育和国家形成进程之间的关系是如何演化的。

本书是由论文集构成的。这些论文试图从历史和比较的角度来解决这些问题。有几篇是以前发表过或者是在以前发表过的版本上修改而成，有几篇完全是新撰写的。虽然所有这些论文都在过去的 3 年中完成的，但它们反映了最初创作的时间和目的。无疑这些文章的集结出版会有某些重复，为了保持每篇论文的一致性，我不想把它们都删除。尽管这些文章在写作初衷上并不一致，但希望此书中的章节最终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反映了一以贯之的论点，不过后半部分从全球变革的性质这个角度来认识，必须保持前瞻性和发展性。

第一章回顾了后现代主义的文献，评论了后现代教育理论家的诉求，这正是当下和未来教育趋势中关心的事。第二章以我以前的著作《教育与国家形成：英、法、美教育体系起源之比较》为基础，比较了欧亚“发展性”国家的教育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第三、第四章考察了英国、德国和法国的国家政权在技术教育中的历史作用和现时作用。第五章由以前与理查德·阿尔德里奇教授合作撰写的文章修改而来，探讨了在一个多元化民族国家——联合王国中的教育和国家意识之间的关系。第六章利用作者最近与希劳里·斯蒂曼合作研究英国、法国、德国、新加坡和美国的教育合格，并分析了中央集中化和分权化教育体系教育结果不同的原因。第七章是一篇有关全球化理论及其对民族国家教育体系的未来所具有的含意的长篇论文。

# 第一章

## 后现代主义与国家教育

后现代主义与在它之前的其他巴黎学派理论输出（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一样，影响英美社会学界的思想话语相对要缓慢一些，而对教育社会学发挥其深刻作用似乎更缓慢。然而，最近 5 年中，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和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思想逐渐在英国、美国以及其他重要英语国家的思想界占据主导地位。虽然在解构主义的文化研究核心地带之外很少有学者将自己与后现代主义紧密联系起来——由于无人能够准确无误地定义后现代主义，因此实际上也很难应对这样的问题——然而还是有许多学者将“文化资本”的概念加入自己的概念体系当中，从而获得了多种多样的新的理论成果，甚至有更多学者含含糊糊地将“文化资本”暗示为文化和社会变迁的标识（signifier）。事实上，后现代主义已经成为英国理论争论的核心以至于成为几期“开放大学社会学读本

(Open University Sociology Readers)”的结构化范式。后现代主义话语现在已经成为再不能被人们忽视的潮流。并且，后现代主义业已成长成为一种衡量所有知识成果的理论标尺。

既然如此，教育社会学领域的争论中后现代主义的声音越来越响亮也就不再令人惊讶了。与其他学科一样，教育社会学家中合格的“后现代主义者”的学者不乏其人，但是更多学者只是都强调自己的学术与后现代主义思想相关。在美国，最负盛名的学者是亨利·吉鲁(Henry Giroux)和斯坦利·阿罗诺维茨(Stanley Aronowitz)。他们站在自由主义左派的立场上解释了教育的多元化和可选择性，故被频繁地当做后现代主义加以引用(Aronowitz and Giroux, 1991)。在英国最具影响力的是詹姆斯·唐纳德(James Donald)。他的著作《伤感的教育》(Sentimental Education, 1992)大量吸收了后现代主义思想，赞赏当代文化碎片化，因为这种碎片化将使“共同课程”的研究变得没有意义，并呼吁教育应具有更广泛的多样性与多元性(diversity and pluralism)。英美从事教育领域的种族和性别关系研究的学者也充分使用了后现代主义的思想资源(Boyne and Rattansi, 1990; Rattansi, 1992)。

然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社会学理论的主流领域中，事实上也不仅仅限于英美的评论中。瓦尔·拉斯特(Val Rust)在《比较教育评论》(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上发表文章说，比较学者必须严肃对待后现代主义，因为后现代主义提出了依照“现代”时期教育目的而设计的教育体系如何与“后现代”时期保持关联的问题。例如，学校起到了普及化的制度作用，可以促进统一的思想，可以加强民族主义观念，可以培养公民自豪感(1991, p.619)。在澳大利亚，简·肯维(Jane Kenway, 1992)认为，文化宽容性、经济全球化以及随“信息革命”而来的时空压缩都暗示着教育的急剧转变；肯维还指出，所有这些已经预示了教育的“商业化”和以制度为本的学习的转型，对于这种转型，付费的海外远程教育的发展就是范

式案例。

显然现在还没有后现代教育理论。然而，在教育研究者中间，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日益形成了一种趋向，它质疑战后以社会民主体制为基础的国家教育的核心价值观和组织化概念，而这些价值观念和概念正是后现代主义者们确认的典型的现代性产物。右派学者经常否认普及教育的需求和可行性，他们通常反对“普及教育”可以或者应该有助于实现社会公正这类进步的社会目标的观点（Scruton, 1988）。他们同样批评公立学校教育变成毫无效率的垄断官僚体制，屈从于“生产者—获益者”模式，他们强调由市场机制管理的体系内多样性和选择性具有很多优势（Sexton, 1987; Chubb and Moe, 1990）左派学者们即便是出于不同的原因，通常也会批评国家教育体制的官僚化；他们还否定通过教育实现社会转型的可能性，并且拒绝将教育作为在多样化人口构成的社会中形成统一（以及不同种族中心主义的、社会性别、资本主义）文化的手段（CCCS, 1981; Aronowitz and Giroux, 1991; Donald, 1992）。后现代主义由于对普遍主义、同质性、理性与进步这些“启蒙的元叙述”持怀疑态度，为左右两派学者提供了思想资源，尤其对左派学者，因为他们试图放弃先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的忠诚，但又没有在哈耶克（Hayeck）和弗里德曼（Friedman）为代表的右翼新自由主义哲学中寻求庇护。

从广义上讲，后现代主义这一术语所代表的思想体系是在三股历史悠久、体系庞杂的思想潮流影响下形成的（Callinicos, 1989）。这三种思潮在现阶段可以粗略地区分如下：（a）针对“现代主义”艺术形式，特别是所谓建筑的“国际化”风格的文化批评。这一潮流试图将后现代主义审美观理论化，并声称将与现代主义的传统彻底决裂；（b）法国“后结构主义”理论家的著作，如福柯、德里达（Derrida）和德勒兹（Deleuze），他们的哲学与尼采（Friderick Nietzsche）相呼应，强调现实所具有的碎片性、异质性和多元性，强调主体与个人意

识固有的不稳定性和多变性；(c)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出现的有关当代社会的普遍理论（general theories），认为当代技术、工作组织和社会形式的发展不同于以往，迫使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重新定义社会组织概念，并提出了像“后工业”、“后资本主义”或是“后福特主义”等名词来指称这种变化（Kumar, 1992）。上述三股潮流都产生了大量的知识成果，既有影响深远极具挑战性的见解，也有昙花一现尚需推敲的看法。在“后现代状况”研究方面，成果斐然的利奥塔（Lyotard）和鲍德里亚（Baudrillard）倾向于折中吸收上述三个潮流，他们通常吸收了每个潮流最鲜明的立场。

20 世纪 60 年代围绕建筑开展了蓬勃的讨论，这场大讨论是有关文化断裂（cultural break）的最明晰解释。在这些讨论中，人们能够明确地辨认出被准确描述为现代主义的早期形式发生了风格和审美的转型。自从城市景观被野兽派艺术的混凝土和玻璃幕墙占据以后，居住在城市的人们开始渴望能够生活在满足他们多种需要和当地的居民生活方式的人性化环境中。建筑师和城市规划者们力图满足人们的愿望，设计装饰较多但不会使人产生压力的建筑，在城市钢筋混凝土的丛林中建造适宜居住的、类似村落的空间。通常，他们将自己的作品定位在背离战后占统治地位的“国际化”建筑风格的立场上。因为“国际化”的建筑风格可以追溯到战前沃尔特·格罗皮厄斯（Walter Gropius）的现代主义、密斯·范德罗（Mies van der Rohe）和韦默·鲍豪斯（Weimar Bauhaus）学派强调巨大、不朽、技术至上以及线性的处理方式，所以新的建筑风格可以被视为真正的后现代主义之作。与此相类似的是，早期俄罗斯建构主义和欧洲未来主义者将自己视为现代主义的精英，所以一些画家和雕刻家对他们的“英雄风格”和技巧至上所持的反对态度也可以说是后现代主义的鲜明注释。然而，这一审美观的根本性转变能否普遍扩展到其他艺术和文化形式中尚属于未知数。

吉尔·德勒兹、雅克·德里达和米歇尔·福柯有关哲学、史学和美

学的著作构成了包含大量内在变数和歧见的繁复庞杂的理论体系。德里达的“文本主义”试图将一切现象作为文学风格加以解构；在他的格言中“没有文本外”而只有主旨的无穷再生。相反，福柯关注制度、话语、管理程序和建筑形式的整个社会机器，以及分散其中的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对福柯而言，无所不在的又被急剧分离正是权力，而对德勒兹而言则是“欲望”。然而，所有后结构主义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对弗里德里克·尼采的共同恩泽。正是从尼采那里他们才能够关注现实的多样性和异质性，看重人的主体的不稳定性和偶然性，在表面的一致性下存在的只是混乱的冲突愿望与动机。尼采将上述认识总结为所有的知识是相对的，只有在其自身的概念框架中方才有效：承认某一观点是否是真理的基础并不在于这种观点能否在现实中获得证明，而在于其服务的目的。真理与本体仅仅是目的性的，是愿望到权力的产物（Nietzsche, 1968）。后结构主义者们止步于尼采对权威和统治权的推崇，而全盘接受了他的相对主义观点。

后现代主义者吸收的第三股思潮表现为关于当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理论。这些理论与以往的工业资本主义模式彻底决裂，把现代社会构成分别贴上了后工业、后资本主义和后福特主义的标签（Kumar, 1992）。自 60 年代以来，这些理论的第一次浪潮指明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长期趋势是新兴的服务业取代了制造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取代资本成为现代社会的核心变量。继伯纳姆（Burnham）之后，有的学者强调生产关系的转变，并且认为正在发生的“管理的变革”分离了生产力的所有权和控制权，这种生产力使得在资本主义组织中，新的经理人和专业人员比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模式下的资本所有者更为关键。第一次浪潮中的理论家们更经常地强调生产力方面发生的深刻变化，认为新的技术促成了“信息革命”的发生，将会改变现代世界的面貌。最突出的是，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 1974）认为信息社会的出现使知识生产代替物质商品的生产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活动。信息社会向全球的延伸和扩展将打破社会和政治体制的旧有界

线，实现麦克卢汉（McLuhan）所说的“全球村”以及“意识形态的终结”——仿效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乏味的“历史的终结”的（Fukuyama, 1992）架构分析东欧共产主义政体解体而提出的一个研究主题。<sup>①</sup>

后福特主义在师承和关注点上有所不同。美国的皮奥里（Piore）和萨贝尔（Sabel），英格兰的鲁宾·默里（Robin Murray）以及澳大利亚的约翰·马修斯（John Mathews）回应了信息社会学派的观点，但他们与法国 Regulation 学派以及利普茨（Lipietz）和阿格利塔（Aglietta）的渊源更深。后两位学者的思想主要关注在资本主义社会正在发生变化的控制制度和工作组织（Piore and Sabel, 1984; Murray, 1988; Mathews, 1989）。换句话说，他们更强调生产关系变革而不是新的生产力：新技术被视为重要但非决定因素。

后福特主义者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这体现了战后社会经济体系的局限性，因为这种体系是以廉价能源供应为基础的。这表明了福利国家和凯恩斯的全面就业和需求管理的宏观经济政策所构成的资本与劳动力的妥协，还有以弗里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Taylor）的工业组织理论和依据亨利·福特汽车生产提炼出的方法为基础建立的生产机制。

福特主义是以廉价和相对统一的商品的大众生产为基础，这种生产满足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40年里逐渐形成的大众商品市场——这一时期经历了世界不景气，之后是复苏和世界大战，然而又是历史上历时最长的资本增长时期。正像葛兰西（Gramsci, 1971）最先概括的那样，福特主义大众生产的特点体现在由福特在其著名的底特律工厂所创造的新流水线装配方法。以专用生产技术、大量半熟

福山如今似乎已经转变了他原来的立场。在他最近的著作（Trust, 1995）中，他似乎发现，除了美国的自由放任、多样性的自由市场之外，还有其他成功的资本主义模式，现在颂扬“信任为本”的资本主义优越性，他声称这是在亚洲资本主义里面找到的。

练劳动力和以最大化任务分工和集权化科层制控制为原则的“泰勒主义”工作组织为基础，福特式的工厂证明了其到迄今为止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来生产廉价商品的能力。这些商品的大众市场首先通过新形式的大众市场、广告和分期付款实现了保障，同时提高最初由福特和通用汽车这样的制造巨人所承担支付比率，也有助于保证商品的大众市场。30年代因过度生产造成的大萧条是极其生动地证明，从长远观点来看还应该满足更多的条件，如连续的流水生产的代价是必须使劳动力获得新待遇，给予贸易组织更多的权力和控制力，以及运用充分就业和提供福利等其他社会“契约”，这就导致公共干预机构和福利国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依据后福特主义者的观点，这一体系到60年代表现出它的局限性。福利国家的支出逐渐变得无法控制，工会的权力对经济所施加的僵硬性威胁到利润。1973年的石油危机结束了廉价能源的时代，而廉价能源正是“烟囱工业”时代大量生产技术的基础。社会模式和生活方式逐渐发生的变化不易察觉，但同样重要，因为它对商品和服务的多样性和质量提出了新的需求，而这正是福特主义的生产体系未能充分满足的（Piore and Sabel, 1984）。这种观点进一步指出，伴随这场危机出现的是由新技术发起却非由新技术决定的新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使日本的高科技、高附加值部门和意大利和联邦德国的一些地区体现了引领浪尖的特征。

后福特式组织提出的防范措施体现在新的以弹性专业化特征的为特征的生产方式（Piore and Sabel, 1984）上。微型技术使运用专用设备生产大量标准化产品可能向运用计算机辅助设计和计算机数字控制设备生产多样的、小批量的不同商品转变。发达的信息系统还可能使“kanban”和即时反应系统通过对供应、存货和销售的瞬时监控实现每日生产和秩序调节。这些弹性的生产系统还能够满足所谓“瞄准机会的市场”提出的不断增长的专业化要求和设计意识的要求；他们对时尚潮流迅速变化做出反应，而且具备将高品质产品销往不断提出要

求的富有消费者的潜力。

构成后福特主义与福特主义分野的并不只是新技术这一个因素。后福特主义者总是将重点更多地放在变革所必需的社会决定因素上。新技术也可以像以往在英国和美国那样，运用原有的工作组织模式，完全依照福特主义者的方式得到充分利用。后福特主义模式的特征在于在已经改变了的劳动过程中运用新技术。这一典型做法包括用责任和决策不断向低层扩展的“平面层级”取代集权化的科层制控制，就像日本使用质量管理链和动机激励系统鼓励车间生产和工艺革新一样。另一个与泰勒主义体系相去甚远的主要因素在于以流动的、多种功能的工作角色或是广泛使用的团队工作取代僵硬的专业化工作角色。因此，就像德国的汽车工厂一样，需要拥有多种技能与能力足以灵活应对各种设计、生产、维护和质量控制任务要求的劳动者。

后福特主义的很多文献对某种经济潮流有着深刻的洞察和普遍的解释。这些文献主要来自对日本、德国和瑞典的企业或是像意大利艾米利亚-罗曼尼亚（*Emilia-Romagna*）工业区的商业网络进行的密切观察，而且，文献也谨慎地强调了它所描述的趋势非平衡性以及未来发展的政治偶然性。在皮奥里和萨贝尔这样的研究者眼中，弹性专业化这样的概念是用来分析可能性的范围的，而不是预言由技术革新所确定的未来手段。然而，其他人就不这么谨慎了，落入了将某地的发展过度泛化的陷阱，从社会分析滑向了未来学（*futurology*）。

丹尼尔·贝尔和“后工业社会”的理论家们在某种程度上夸大了在发达经济中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型。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服务部门的就业份额比例的确增长了，但是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减少最初的农业从业人员为代价的，结果导致制造业的生产能力强于服务业。制造业在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并未显著下降，而在日本和许多新兴的工业国家中却增长了。而且，许多后福特主义者夸大了新技术潮流和生产过程对产生高技能劳动力的作用的趋势。按照他们的观点，从新兴信息技术和机器人技术中建立的体系有可能解构工人的技

能，同时要提高他们的技能。事实上，最能共同观察到的模式是进入到高技能、灵活的高薪工人这个中心与临时的、低技术、低薪工人这个边缘的劳动力之间的两极分化日益严重，而低薪工人的灵活性形成了半熟练工作和不稳定工作之间的水平流动，例如，契约的灵活性而不是功能的灵活性（Ainley, 1993）。这一劳动力分隔通常加剧了现有的性别分工（Jensen, 1989; Pollert, 1988）。后福特主义企业中不断增加的工作民主化观点也同样被显著夸大了（Mathews, 1989）。平面层级制通常仅仅意味着削弱中层管理，从而导致决策过程不断集权化，从而加重了较低层员工的工作，使他们缺乏真正的自主权并眼见自己的职业生涯之路被切断。日本、中国台湾和韩国的经济奇迹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各级水平的雇员工作时间大大增加创造的（Amsden, 1992; Wade, 1990）。

后现代主义是从上述三种思潮中衍生出来的，不过它是一种折中的、通常是不忠实的感觉论思潮。后现代主义者——利奥塔、鲍德里亚及其追随者——沉醉在夸张中，忽视了他们前辈学者更有价值的学说以及他们之间的细微差别，对要抛弃的后现代话语的新格言的概括最不严密。对他们来说，每件事情都是不同的，即使他们原本是一样的，因为不同的就是新的，而新的就是好的。后现代主义被定义为与现代相对——而且如果这就证明了后现代，那么现代性必须重新被发现。无论如何，对后现代主义者而言，历史没有任何意义。

利奥塔将后现代定义为“对元叙事的怀疑”（1984）。因此，现代性一定是“借助元话语使自身获得合法性的任何科学”。现代主义被建构成一套“宏大叙事”，这套叙事据说在历史上来源于启蒙运动（见 1984, pp. xxxiii - iv, 5）。这些宏大叙事包括信仰科学理性、历史进步、个体主体的自主性、客观理性的可能性以及事实上的任何试图发现社会结构和历史发展整体模式的整合或连续的思想体系。后现代主义反对这一切，认为任何“整体化”思想体系，例如，像马克思主义或是自由主义或是科学，他们本质上都是极权主义的。对后现代

主义者来说，经验是变化的、暂时的，真实是片段的、不可知的，历史是偶然而无方向的。个体主体没有稳定的同一性，意识只是变幻的话语和视角的暂时连接，而这些话语和视角不允许有固定参照点。因此，后现代艺术必然是拒绝一切宏大叙事的。它的典型特征是模糊、似是而非与“自相矛盾”，推崇通过讽刺地模仿、蒙太奇和互文性、描摹现实的不确定性和异质性。诚如戴维·哈维（David Harvey）所说，“后现代主义在碎片的、嘈杂的、变革的潮流中飘浮旋转甚至沉沦，仿佛这就是它所有的一切。”就其局限性而言，它故作“肤浅”，甚至是具体的，有意强调包含性。在鲍德里亚看来（1986），后现代性似乎不可避免地趋向“超现实”，趋向真实与想像不可分辨的模拟状态。在后现代条件下，像利奥塔所说，理性的思想是不可能的；留下的一切屈从于语言游戏中所赞美的不确定的现象多样性。

上述所说的理论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在于其深刻的历史虚无性。后现代主义者试图要收归己有的、他们将其与现代社会的特征相联系的大部分概念，都可以在现代性的美学和哲学中找到（Berman, 1982）自启蒙运动以来，始终有一股强有力的有意识的反理性主义美学和哲学思潮。这一传统在英国源自于 18 世纪末的布莱克（Blake）、弗斯里（Fuseli）和斯韦登伯格的学派（Swedenborgians），经由柯勒律治（Coleridge）和华兹华斯（Wordsworth）的“浪漫保守主义”（romantic conservative）一线发展到卡莱尔（Carlyle）和拉斯金（Ruskin）。由于这一传统在很多方面是反现代的，它在 18 世纪最后 10 年中与法国其他传统相融合，像自称是现代主义的兰博（Rimbaud）学说，波德莱尔（Baudelaire）和印象主义，结合出独一无二的前现代和反现代意识的混合物，也就是彼得（Peter）、王尔德（Wilde）、哈斯曼（Huysmans）和比尔兹利（Beardsley）的世界末日文化。自那时起到 1930 年间，这一艺术运动空前繁荣——符号派、立体派、未来派、构成派等等——自我意识使他们认同现代性，在早期表现为对革命运动的同情（即马雅可夫斯基和毕加索）。在二次世

界大战期间，他们通常转向右派 [ 即埃利奥特 ( Eliot)、庞德 ( Pound)、劳伦斯 ( Lawrence ) 和席琳 ( Celine) ] (Hobsbawm, 1990)，只要人们能够准确地界定现代主义时期，他们通常就被当做现代主义时期的杰出代表。

利奥塔和鲍德里亚著作中的思想在现代主义时期的艺术中，有时甚至在较早期的反理性主义的著作中都有明显的体现。尽管威廉·布莱克支持他所处时代的革命运动，但他根本上是反理性主义者，推崇想像的权力，反对当代理性按部就班的思想镣铐（也就是他把它讽刺为残酷的神性，Urizen）；柯勒律治以及卡莱尔这样的功利主义思想的批评家也是一样的，反对政治经济学成为“走入沼泽的科学”、反对贫瘠得宛如现金往来的思想境界的极端观点。经验的碎片性和暂时性是像波德莱尔这样的晚期诗人最喜欢的主题，波德莱尔将现代性定义为“短暂的、易变的、随情境变化的”，甚至就马克思本人——制度的始作俑者——也如马歇尔·巴曼 ( Marshall Berman) 提醒我们的那样，对“所有的一切都融化在空气中的”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变化的特性始终保持关注（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1844；Baudelaire 引自 Berman, 1982. p.133）。

在严格意义上的现代主义时期，艺术家和作家明确地采纳了许多后现代主义者提出的观念。从 19 世纪中期以后，许多作家关注绝对道德的缺乏和知识的相对性。陀斯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中声称“一切都是可能的”，世界末日派作家不断地探索知觉的局限与相对性 (Huysman)、时间 (Proust and Bergson) 与个体身份 (Wilde)。劳伦斯在《彩虹》与《恋爱中的女人》中通过分解“角色的固定自我”重新界定小说的努力，预示了后来文学发展的方向，就像他的名言“事物在其关系中才是真的，没有更多了”可以当做后现代主义的必要之物一样（引自 Kermode, 1973）。如果后现代主义也像济慈 (Yeats) 这样的先驱者及其诗歌的“伪装”一样被表面现象、模糊性和变化的身份认同所困扰，那么在艺术与生活、想像与现实的矛盾冲突中开辟